

领导权:基于中国实践的权力类型学研究^{*}

姚 中 秋

内容提要:领导权是现代政党拥有的一种权力,中国共产党将其发展到相对完备的状态,党章和宪法均明文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全面领导权。经由内在视角分析可见,领导权之正当性在于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并以此发挥领导作用,故中国共产党是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基于对先进性的自觉和保持,领导权有如下性质:自我构建性、创生性、高度自主性、集体性、全方位性、自适应性、责任性、高水平公共性、发展取向、进步主义、“高级性”、自我反思性。领导权的功能包括:辨识、确定人民和国家前行的方向与道路、做出战略性决策,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教化,发现、培育、任命干部,组织和动员,自由创设制度,整合多元的社会与国家权力等。经由领导权,群众“成为”当家作主的人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领导权 先进性 权力理论 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最后一段宣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政治学角度看,领导是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政治权力形态,即“领导权”。从法理和政治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当代中国的根本性、至高性、中心性政治权力;从历史的角度看,成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以此领导权组织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规范和事实均要求我们认真对待领导权,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权力类型进行学理性研究。

政治学界对此已有所研究: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第九章第三、四两节从政党理论视角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①;林尚立的《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单列《领导》一编,置于《治理》《发展》两编之前,突出了领导权的根本性、至高性、中心性地位^②;杨光斌、景跃进等学者主编的政治学教材都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并详尽列举了其领导方式、体制、范围等^③。基于这一事实,有学者把中国共产党定性为“领

^{*} 本文写作过程中,杨光斌提出过宝贵意见;编辑部和三位匿名评审人提出了重要而宝贵的修改意见,谨表谢忱。

^①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第255—2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年版。

^③ 杨光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导党”^①。宪法学界基于宪法文本,对领导权之宪法内涵及其与其他国家权力间的关系有所研究^②。更有不少学者受葛兰西(Gramsci)文化领导权概念影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

尽管如此,相对于其在政治理念、制度、过程中的根本性、至高性、中心性,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研究仍显薄弱,既有研究也多局限于中国特殊论的历史性或结构性描述。本文拟从当代中国复合的权力体系中分离出领导权,作为一种独立而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力类型,以政治现象学、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进行学理性研究,即暂时悬搁既有权力、政治、国家理论,直面历史和事实本身,通过直观描述,对其进行初步的概念化。首先简单论述政党领导权的起源与发展,进而讨论领导权的正当性来源、性质、功能,以及领导权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

一、领导权的起源与发展

本文所谓领导权是现代政党所构建、掌握和行使,旨在引领人民(局部或全体)和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按其纲领实施集体行动之政治性权力。这种权力最早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西欧,中国共产党将其发展到相对完备状态。

政党是现代政治现象。最早在西欧,现代社会初步形成之时出现现代政党,充当“社会和政府之间的核心中介组织。”^③政党运用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和工业化所提供的组织技术,吸纳利益分化的民众参与政治;其内部逐渐形成组织化控制机制^④,这就形成了政党的内部领导权;政党运用组织化力量在“社会”中动员、组织群众,影响国家政治进程,获得执政权后更有机会实施政治纲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国家,这就是政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政党以其内部领导权构建、行使国家领导权,前者的发育水平决定后者的能力大小;两者在各国都有很大差异,从世界范围看,呈现出从西方到东方持续加强的明显趋势。

英国政党是弱领导权模式的典型。英国初步完成工业化,社会结构大变,乃于19世纪中期持续进行议会改革,辉格党、托利党随之逐渐现代化:接受新兴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观念,吸纳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建立政党官僚化组织,由此转化为现代的自由党、保守党。它们生成于现代国家建制之内,天然秩序导向的;其纲领只是政策的临时组合,无意于整全性社会改造,也就无意于构建强大政治领导力量,无心于内部组织化、领导权建设;其功能只是“代表”特定群体参加议会选举,将其利益诉求带入政治决策过程。它们属于代表性-分利型政党,即列宁在《怎么办?》中所说的“尾巴主义”政党^⑤。英国政党的内、外领导权都不甚强;美国的特殊地缘条件使其政党的领导权水平更低。

19世纪末形成的西欧工人政党的领导权水平有一定提高。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了工业化时代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精神上的先进性,据此断定“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⑥。《共产党宣言》等著作论证了共产党人相对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确立了其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不过,西欧工人政党的主流形态是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最为典

① 参见郝铁川:《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中领导党地位的形成》,《南都学坛》(南阳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4期;陈尧、左梦莹:《“领导党制”:类型学视角的中国政体新认识》,《探索》,2021年第3期。

② 参见陈云良、蒋清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法理分析论纲》,《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3期;蒋清华:《现行宪法中党的领导之法教义学阐释》,《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③ G.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2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④ 参见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第27—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⑤ 《列宁选集》,第1卷,第338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型,它领导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有相对整全的社会改造方案,长期处在非法状态,因而构建了自主的、较强的内部组织化领导权,动员、组织工人进行政治抗争;其抗争力量足够强大,迫使国家权力做出让步,可见其内外领导权强于英国政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德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不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工人政党得以合法化,也就逐渐“修正主义化”,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相应地,西欧工人政党内领导权有明显退化之势,逐渐丧失了引领、控制、塑造国家政治的能力,退化为建制内代表性-分利型政党。

布尔什维克是从社会民主党模式中分化出来的,进一步构建了强大的领导权。俄国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带,经济落后、政治专制,在《怎么办?》中,列宁认为,这一情势决定了俄国工人阶级完全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改善境遇,必须进行政治革命。但工人群众只能“自发地”产生经济要求,政治革命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这就需要构建“先锋队政党”。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着力阐述了先锋队政党的组织原理,强调指出:“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①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正在于此:革命的领导者不是笼统的工人阶级,而是由其先进分子组成的党^②。据此认识,列宁力排众议,构建了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格的先锋队政党,它有多层、多面的内外领导权结构:首先,党内有严密的层级化领导体系,领袖居于中心位置,领导一小群职业革命家;他们共同领导全党;每个党员在一个党小组之中,所有党组织纳入层级化组织体系之中。其次,党在政治上领导工人阶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又在政治上领导农民等其他阶级;为此,党组织领导覆盖各类群众的社会组织。布尔什维克的内部领导权广泛覆盖、深入渗透在革命组织、运动之中,具有全盘创造新秩序之坚定意志和能力——这是人类政治史上一个伟大创造^③。

革命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的政党领导权制度化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但党的领导权仍是其体制之枢纽。斯大林探索以党的领导权管理国家、推进工业化的机制,《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对此有所揭示:党作为指导力量,以各种群众组织为“传动装置”或“杠杆”,把所有社会性力量“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④。斯大林以党的领导权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工业化模式,显示了政党领导权强大而普遍的政治能力。

经由共产国际的中介,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直接启发了中国共产党构建领导权的意识。不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明显缺乏领导权意识,后来又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与党的领导权之间摇摆不定^⑤。国民革命中的复杂阶级关系与多重革命目标,推动中共领导人开始面对领导权问题,瞿秋白对其术语定型做出较大贡献^⑥,但他讨论的仍然主要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则让中国共产党转而重视党的领导权。此后,通过内、外组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陆续构建了多层次、全方位的领导权,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研究,此处只做简单概括。

中国共产党首先确立了革命的全面领导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最为重要;在根据地则构建了对局部地区政权的全方位领导权;延安整风实现了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整合,强化了内部领导权,进而强化了外部领导权,终于在1942年明确提出一元化领导的政治原则:党“应当领导一切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473页。

② 参见陈明明、程文侠:《先锋队政党的构建:从意识形态到组织形态——关于列宁建党学说的一个讨论》,《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③ 参见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06—315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④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11—413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⑤ 参见周家彬:《阶级与党:中共革命领导权双主体的形成与整合(1925—1935)》,《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4期。

⑥ 参见李放春:《瞿秋白与“领导权”的定名——Hegemony概念的中国革命旅程(1923—1927)》,《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5期。

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①。运用一元化领导权的强大动员、组织能力,中国共产党迅速夺取革命胜利,通过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国家构建过程^②,全面的革命领导权转化为全方位的国家领导权——事实上是党的领导权创建了各种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又内嵌于其中,从而形成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形态;党组织深入城乡社会基层,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事务进行全面管理,形成政党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③;党领导工业化和国家发展,形成了政党中心主义的工业化和国家发展模式。从世界现代政治演进角度看,政党领导权在此达到了相对完备的状态。

不过,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党内外、政学各界对党的领导权之法律、政治地位、范围,及其与其他国家权力、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有过认识上的曲折,尤其是理论学术界多以西式政党制度与党-政关系模式为尺度衡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认定其不够“现代”,呼吁进行“转型”。十八大以来,这一趋势在政治上得到根本扭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④。这既是一个政治定性,也是一个历史描述;据此,党的领导权是中国政治学应当认真对待、深入研究的议题。

二、领导权的正当性

权力是能够驱动其他组织或个体采取特定行动的力量,其长期存在且为人信服,从而低成本、有效地影响受动者之前提是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韦伯(Weber)构建了现代主流的权力正当性理论:支配是权力的主要形态,它有三种正当性的纯粹类型:理性的、传统的、超凡魅力的^⑤。这三者显然均不能解释领导权之正当性。须抛开这一理论,为领导权另寻正当性。

笔者尝试进行内在视角的解释。党章《总纲》第一段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定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表明党是二元先锋队政党;关于入党条件,首先规定申请者为“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并规定了严格考察程序。可见,中国共产党是先进分子组成的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团体”^⑥。党高度重视先进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领导”一词出现了80多次,“先进”一词则出现了100余次。“先进”意谓少数人在众人之中居于领先地位,为他人所观瞻,从而拥有某种权威,产生引领作用,这就是“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是凭借其先进性而构建和保有领导权的,领导权的正当性来源就是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全面的,参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和党章的规范,可分解出理论(意识形态)、政治、道德三个维度。党的先进性既体现在与国内其他群体相比更为先进,也体现在与其他国家或其政治团体相比更为先进。后者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至关重要:19世纪中期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覆盖全球,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第4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参见杨光斌:《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中心主义》,《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③ 参见郭定平:《政党中心的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6页,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

⑤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第318—3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⑥ 刘海波:《先进性团体政治的中国实践与一般理论》,《经济导刊》,2015年第4期。

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①。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体现在找到了在此体系中实现翻身、进而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先进社会的理论、道路、组织和正确战略。

第一,理论先进性,它决定了道路的先进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须以世界性资源解决;首先要在世界层面上确定政治发展之路,这就需要借助世界性的现代化理论。在最早启动工业化的西欧先后形成了解释和引领现代国家构建与发展的两大意识形态谱系:支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批判该体系并在政治上寻求推翻该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后发国家的思想和政治力量须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抉择,而理论的抉择也就是国家构建、发展的道路抉择。

清末民初,中国被锁定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不自觉地走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蒋介石则在1927年与上层精英群体结合,自觉选择了这条道路。其结果是,中国的依附性日益扩展、持续加深,无从自主发展。五四运动中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列主义,建立先锋队政党,以反帝反封建为革命任务,以建立社会主义为目标^②。即便在西方思想脉络中,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先进的;20世纪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革命、实现发展是后发国家解决其独立、发展问题的可行方案。但世界性理论发挥作用,必须借助内在的社会政治力量,而这是高度地方性的。列宁和毛泽东致力于对先进的世界性理论进行本土化重构,在历史关键节点上为党、为国家做出正确的方向和战略抉择,从而成为“革命导师”。斯大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理论”的重要性^③。

中心地带的先进理论对急于寻求出路的边缘地带的先进知识分子具有强大吸引力,因而先锋队政党的创始者基本上都是勤于思考、具有理论构建能力的知识分子,自觉地以“主义”、理论建党,俄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都有这个特点。他们所介绍的世界性先进理论,对党外知识分子也有知识吸引力和精神感召力。这样,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能力构建普遍的思想领导权,进而构建文化领导权,并在竞争性理论、观念、学术场域中压倒其他力量,进而赢得日益广泛的民心。当然,先进理论也指明了政治行动的正确道路,其所取得的实践绩效有助于构建、强化领导权。

第二,政治先进性,主要体现为组织先进性、目标先进性。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历史唯物论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已成为工业化大生产的桎梏,因而是落后的;能够解放被压迫、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的社会主义目标更为道德而先进。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阐明反抗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首要革命目标,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目标。从中国内部和世界范围看,双重解放的目标是先进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为双重解放提供了先进的政治组织形态,即列宁创建的先锋队政党,其政治动员、组织能力领先于西欧工人阶级政党,更领先于自由主义的代表性-分利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定位为二元先锋队:既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基于中国文化进行中国式思想、组织建设。由此其内部领导权更为有效,领导重建全面秩序的能力更为强大,而这正为政教秩序全面崩溃后的中国所急需。

二元先锋队定位也让中国共产党在经济落后的农业社会始终抱有极为先进的政治志向。无产阶级形成于工业化大生产体系之中,因而具有先进性的政治品性,又有突破资本主义的政治意志,因而是政治上的先进阶级。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农民,恰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

① 对此体系的形成及其不公平结构的分析,参看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收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巴里·布赞、乔治·劳森:《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② 参见姚中秋:《世界体系的裂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

③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99—214页。

政治定位让党从整体上始终保持了工人阶级特有的高水平组织纪律性,并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这对中国来说是十分先进的^①;从世界体系角度看,以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也是后发国家的唯一出路^②。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政治定位则让党以反抗帝国主义、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为根本任务,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是进步的,从世界范围看也是进步的;该目标又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国历史中具有“存亡续绝”的历史文化正当性。以上种种目标的逐次提出、坚持和逐步实现,让中国共产党赢得越来越多的民心,从而构建了日益全面的领导权。

第三,道德先进性,构建出人格化权威。列宁组建先锋队政党,首先重视秘密活动状态所要求的政党伦理,包括忠诚、组织性、纪律性、牺牲精神等;中国共产党延续了这一点,又在延安时期有重大发展,强调党内斗争以“治病救人”为目的,维护党内团结,塑造同志式友爱;接续中国传统政治观念,重视党员、干部的“私德”;毛泽东发表“老三篇”,全面阐明共产党人的道德纲目;刘少奇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阐述共产党员党性养成之道。相比于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党员道德先进性的塑造和保持,使其整体道德水平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从而在道德化的中国社会赢得民众的普遍尊重,享有崇高道德权威。

党员、干部的道德先进性还有另一层功能:它把党在理论、政治上的先进性予以人格化,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对群众来说,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在场的、可切身感知的——这就是群众路线的道德基础。党员对党的先进性进行全时、全场景的证明,持续地构建和巩固领导权的正当性。

总之,不管是从中国立场看,还是从世界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政治、道德等方面都是先进的。因此,即便在革命胜利之前,凭其先进性也拥有巨大影响力,拥有对国家的部分领导权,这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以其先进性赢得各阶层的人心,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各方广泛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权之产物。

正因为先进性是领导权的正当性来源,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其目的就是保持先进性:因应社会的变化创新、发展理论,以保持理论先进性;进行组织建设,保持和提高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能力,以保持政治先进性;对党员,尤其是对干部持续进行教育培训,定期进行整风,以保持道德先进性;坚持“自我革命”,同样是为了保持全方位先进性。

因此,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形态和政治行为逻辑,先进性是关键。党对所有人开放,但绝非全民党,因其有严格的党员发展标准;但党也不是西方社会和政治理论所说的“精英集团”,因为党以先进性为发展党员的标准。因此,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先进性团体,在世界政党谱系中可将其定位为“先进性-领导型政党”。先锋队政党是政治性命名,有学者沿用之^③;也有学者谓之“使命型政党”^④。但考虑到中国共产党以其全面先进性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行使全方位领导权,“先进性-领导型政党”的学术定名可能更为准确:先进性是权力的依据,领导是其权力的行使方式。

三、领导权的性质

理论、政治、道德上的先进性决定了领导权的特有性质。从结构上看,领导权有如下性质:

-
- ① 史华慈注意到:“尽管他们是如此置身于一个农民的环境,党的领导人却从来没有怀疑他们是历史眷顾的负有使命的人,他们注定要领导中国走上工业化社会主义的道路。”(本杰明·史华慈:《中国的工业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18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 ② 参见迪特·森哈斯:《欧洲发展的历史经验》,第203—2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 ③ 陈周旺、申剑敏:《先锋型政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历史-社会的分析》,《学海》,2021年第4期。
- ④ 参见唐亚林:《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

第一,领导权是自我构建性权力。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是先进性—领导者团体自我获取、积累、自我确信的内在品质,以此自我创造出领导权,并自我肯定为其他一切组织和力量的领导者,以理念、绩效、道德形象等说服他人接受其权威。可见,领导权不同于西式政党由竞选所获之法定执政权。领导权的自我构建性质至关重要,带来以下诸多性质。

第二,领导权是创生性权力。自我构建的党的领导权是先在的,为实现其目标可自由创设各种必要权力,比如创造军队即创设军事性权力,设立政府即创设行政性权力,创造各种群众团体即创设社会性权力,创办国有企业即创设经济性权力。因此,领导权是一种“元权力”,可创立其认定需要之一切国家与社会权力并加以领导,从而构造出多元一体的复合权力体系。

第三,领导权是高度自主性权力。针对西方国家(即政府)被社会力量控制、成为其交换利益之平台的弊端,有学者提出“政府(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理论,且把自主的希望寄托于精英官僚的理性选择^①。然而,“理性地就事论事”的官僚是去政治化的,政治自主意识最多只是团体自利意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自我构建的,天然地超越、独立于既有权力体制和各种社会力量,拥有高度自主性,甚至是“绝对”的。高度自主的领导权所创设之政府同样拥有相对于社会力量的高水平自主性。党和政府的高水平政治自主性是中国推进现代化之制度保障^②。

第四,领导权是集体性权力。领导权自上而下地分配,领袖居于崇高地位,并有一个核心政治领导者集团——相当于列宁所说的职业革命家群体;但普通党员对其周围群众也有一定领导权——至少可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组织,集体掌握和行使领导权。集体性使领导权有别于君权,弥散性使之有别于官僚的支配权,高度组织性使之有别于西式政党的弱领导权。

第五,领导权是全方位权力。迈克尔·曼(M. Mann)区分了广泛性(extensive)权力与深入性(intensive)权力^③,领导权兼具二者,前者体现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具有广泛统合性;后者体现为“支部建在连上”群众路线等,具有高度穿透力。领导权由此实现对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政治体内一切领域、层面的全面覆盖与深入渗透,真正做到“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

第六,领导权是自适应性(self-adaptive)权力。中国共产党具有高水平的自适应性,在其百年历史中多次进行重大乃至革命性调整^④。适应、调整的动力在于保持先进性的内在需要,为此领导者集团密切关注内外因素的变化,及时而主动地进行调整;组织性、纪律性和自主性使之不受内外既得利益、制度的束缚,高效地进行调整^⑤。

再从价值上看,领导权有如下性质:

第七,领导权是责任性权力。这是由先进性决定的,孟子借伊尹之口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中国共产党的逻辑与此类似:先进性构建出领导权,必然以启发、引领群众前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伦理和政治责任,因而领导权是责任性权力;这种责任是自我施加的,而非外在强加的。

第八,领导权是高水平公共性权力。先进性造就了领导权追求公共利益的意愿,自主性又使之不服务于任何特定群体,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① 参见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找回国家》,第2—27页,三联书店,2009年版。

② 参见周光辉、彭斌:《国家自主性: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以权力、制度与机制为分析框架》,《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5期。

③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第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④ 王绍光:《学习机制、适应能力与中国模式》,《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

⑤ 比如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过多次根本性调整,参见姚中秋:《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两轮脱钩—重新挂钩:以自主发展为中心》,《世界政治研究》,2021年第2辑。

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①领导权的唯一存在理由是领导人民发展先进生产力,创造先进文化,增进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最高水平的公共性。

第九,领导权是发展取向的权力。霍布斯式政府追求“和平与共同防卫”^②,洛克式政府以保障财产权为目的,韦伯式政府运用支配权维护秩序。凡此种政府,均主要行使支配权,其目的是消极的、秩序取向的。领导权奠基于理论、政治、道德的先进性,先进是时间-进程性概念,领导就是引领、组织人民前行、实现国家发展的活动,包括政治发展、经济发展与国民道德的提升、社会风俗的改善等。因此,领导权是发展取向的权力,其所塑造的国家不是静止的状态(state),而是发展的、“止于至善”(《中庸》)的历史性过程。

第十,领导权是进步主义的权力。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进步主义精神氛围中,追求人类全面进步;这一理想让中国共产党将其权力奠基于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并以追求进步为己任:社会主义目标相对于资本主义是进步的,推翻帝国主义的支配是进步的,实现国家发展、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同样是进步的;宪法序言还宣示,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之国家不是价值中立的,也不是现实主义的,而坚定地追求进步价值。

第十一,领导权是“高级权力(higher power)”。这里借用了自然法学说中的“高级法(higher law)”概念^③,意谓领导权凭其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而在位格上始终高于其所创设之各种权力,引领之、审查之,矫正其不当行为,甚至可以取消之。移用宪法学术语,领导权内涵了绝对的“违宪审查权”,而其审查依据既有党内法规、国家法律条文,更有先进性尺度,党纪是严于国法的。

第十二,领导权是自我反思性权力。领导权之正当性在于其先进性,略有松懈,就可能蜕化;时代变化,必致先进性流失;而丧失了先进性,领导权就不稳固。因此,党对保持先进性有高度自觉,领导权内置了自我反思、自我监督的机制。当然,只要是权力,就可能衰败,而内在的先进性让领导权周期性地自我唤醒,进行自我革命,进而振奋其所领导的整个权力体系。

总之,领导权以先进性为本,从而成为性质十分独特的权力。《周易》乾卦《彖辞》对乾健之道的描述,或可用于刻画领导权:“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领导权是“乾元”之权,构造出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多元一体的复合权力体系,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进步的国家秩序,且有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之历史自觉和政治能力。

四、领导权的功能

领导权是权力,但它是政党的权力,而且是基于先进性的政党的权力,因而与王权,与现代官僚制政府的权力,也与代表性-分利型政党的权力有很大区别。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笔者分解出领导权的七个维度,也即领导权的七个独特功能:

第一,辨识、确定人民和国家前行之方向和道路,进行战略决断。政治是自觉行动;尤其是当一国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而处在被支配地位,面临多种抉择,需要领袖、领导者集团凭其先进理论和现实洞察力判断大势、分析时局,为人民和国家决断前行之方向与道路。而且这不是一劳永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1—12页,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② 霍布斯:《利维坦》,第132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 爱德华·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第IV—V页,三联书店,1996年版。

逸的,国内外局势持续变化,需要持续地观察、分析、决断。于是,党的历史上就形成了先后相继的阶段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核心功能就是不同历史阶段辨识和确定革命或国家发展之方向、道路,作为人民和国家的“行动指南”。这是领导权的首要体现,也是最高的政治权力,它为一切其他权力的运转铺设轨道。在此之下,领导权制定政治战略,组织各种力量协同行动。

第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确定了方向和道路,如何引领人民、国家前行?中国传统政治观念高度重视君子的示范作用,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一观念,党章总纲要求“发挥全体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第一章《党员》第二、三条列举了党员应当具备之道德素质,包括政治的、私人的道德;又明确要求党员“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笔者之所以将其划入权力行使方式范围中讨论,是因为先锋模范作用具有影响下级、影响群众的力量(power),其效果类似于权力,是人格化的道德型权力。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权力向责任的反转:意欲发挥领导作用的先进分子须反身自我约束、自我提升。这一点是领导权最为独特之处,表明领导权从本质上看是非强制性权力,完成于领导者与群众之间的“感动”。

第三,教化。领导权的正当性在于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本身有赖于教化、养成,因此党章规定党员必须终身学习。基于同一政治逻辑,党领导群众,高度重视宣传教育,也即启蒙、教化。党章规定,党应通过各种教育、文化、宣传活动,“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宪法序言规定国家根本任务之一是进行精神文明建设,总纲有多个条款,尤其是第二十四条具体规定了国家的教化权力或责任。广泛而持续地对党员、对所有群众进行教化,这是领导权的重要行使方式,在这里,政治不是去价值化的,而有明确道德属性。教化的目的不是西方政治理论所想象的那样对民众进行精神驯化、控制,而是以先进性引领民众,提升其知识和道德水平。在这里,领导权同样呈现为责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

第四,发现、培育和任命干部。此即组织人事领导权。领导权是由干部群体集体掌握和行使的,“干部国家”^①是领导权的“肉身”。干部的遴选标准是先进性,党章《党的干部》一章对此有全面规范。因而,干部不是“自然人”,而是人为培育出来的双重先进分子:既先进于群众,也先进于一般党员。为此,党建立了全覆盖的党员、干部培训体系,干部必须终身学习,接受严格、全面的理论、政治和道德教育,以拥有和保持先进性。这一制度创造了前述自适应性的技术条件:党一旦做出调整方针、政策的战略决策,立即对干部进行大规模培训,调整干部政策,即可迅速实现战略调整意图。可见,干部是人类政治能动者的一个独特类型,其性质和政治行为逻辑完全不同于韦伯定义的理性化官僚,而是统合了官僚、政治家角色,并且是教化者。不能把干部混同于官僚^②。

第五,动员与组织。相比于传统的家族、部落等组织的血缘限制,相比于现代军队或官僚体系的组织性限制,政党在动员、组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先锋队政党把这一优势发挥到极致,以其强大的内外领导权,拥有全方位动员、组织能力。宪法序言宣布:“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唯有党的领导权可以穿透各种组织壁垒,实现“集中力量”的最大化。苏联、中国凭借领导权的动员、组织能力实现了工业化。

第六,自由创设制度。荀子说:“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王制》)领导权

① 参见王海峰:《干部国家:一种支撑和维系中国党建国家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的制度》,第13—2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干部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有一定连续性,参见姚中秋:《领导性治理者:对士大夫的历史政治学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是集体性、制度化的“法之原”。谢茨施耐德(Schattschneider)早就指出:“政党的法外性是它诸多显著特征之一。”^①领导权构建了政党中心主义的法治秩序,它在制度之中又超乎其上^②。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责任驱动的领导权积极探索解决方案;新方案可能越出宪法、法律,但领导权赋予其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实践证明新方案有效之后,领导权指导立法程序赋予其合法性(legality)。强大的领导权克服了法律、制度内在固有的惰性,让法律体系呈现出明显的“反定型化”品质^③。最明显的例子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共同纲领”在内已制定过五部宪法,“八二宪法”又已经历过五次修改。而按照亨廷顿(Huntington)的论述,这一能动的法治秩序恰恰合乎现代国家的标准^④。

第七,整合多元的社会与国家权力。现代国家追求高水平整合,政党是重要机制。处在“强社会、弱政府”状态下的后发国家尤其需要政党发挥其覆盖、穿透的整合功能。中国共产党具有高水平的整合意识和能力^⑤:“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体现了整合意识;党本身实现了高水平整合,其对外领导权就有极高政治自主性,从而可以高效进行两个层面的整合:在下层,进行社会与文化整合;集体性领导权不被任何集团所控制,可以穿透所有社会组织的壁垒,甚至消灭一些梗阻性群体,因而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直接统治是通过党的领导权实现的^⑥。在上层,进行多元权力的整合;领导权创设了各种国家和社会权力,又对其加以领导、控制、监督,实现多元权力在纵向和横向上的高水平整合,并避免权力私有化。西方学界关于整合的讨论集中于前者,但后者同样至关重要。党的领导权结束了晚清以来日益严重的国家离散化趋势,在极高水平上重建了政治的“大一统”。

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一个领导权统摄的多元一体的复合权力体系。领导权是本源性权力,以其高水平的组织化,保持高水平的政治自主性;它又创生出专业化的立法、政治协商、行政、司法、监察等国家权力,分工管理国家各方面事务;还创设出各种社会性权力,分类、分层管理群众;通过党组织或党员的嵌入,领导权又内在于这些多元权力的组织和过程之中,发挥引领、控制、协调、监督等作用;由此,多元的国家和社会权力在结构上合而不散、有机统一,在价值上保持先进性、追求进步性。这个多元一体的权力体系既适应了国家管理、社会治理的理性化、专业化,又确保了多元权力的整体性、公共性和适应性。因此,领导权不仅是一种权力,也是理解中国的一个基本方法。

从政治学角度看,刻画中国共产党所拥有、行使之权力的恰当概念就是领导权——当然是完整理解的领导权,学界一度使用的执政权概念则是不充分、不准确的^⑦:领导权在逻辑上、历史上先于执政权,在位格上高于执政权,在范围上大于执政权,比如组织、构建和领导社会^⑧。尤其重要的是,执政权概念遮蔽了先进性赋予领导权及其统摄的权力体系之鲜明价值取向、明确道德意图,而这是中国得以持续发展、进步、并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动力所在。

五、领导权与人民当家作主

最后我们讨论领导权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

① 谢茨施耐德:《政党政府》,第5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② 参见强世功:《从行政法治到政党法治——党法和国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张龔:《改革时代的转型法治与政治代表》,《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

③ 参见田雷:《“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

④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91—96页。

⑤ 参见王邦佐:《社会整合: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学术月刊》,2001年第7期。

⑥ 比如党的领导权整合乡村,参见徐勇:《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⑦ 参见蒋清华:《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之辨——“执政权”之歧义和误用》,《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8期。

⑧ 参见景跃进:《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8期。

西方政治理论中与人民当家作主对应的理念是人民主权论,卢梭(Rousseau)和美国制宪者均以之作为政治思考之基本预设,其民主制度也据此设计。然而,作为整体的人民显然无从成为实践的权利-权力主体,于是在西式政治实践中,人民离散、降格为选民,定期投票选举其代表,代其进行政治的表达、行动,这就形成代议制政府。但有西方学者早就指出过代议制之双重困境:选民易被操纵,代表缺乏德能,于是,“现代文明的代议制政府,其自然趋势是自然的平庸……其结果就是将主要权力置于越来越低于最高社会教养水平的阶级手中”^①——这与先锋队政党对先进性的自觉和保持恰成对比。而且投票之时,选民不是作为主权者而是作为分利者,谋求私人或集团利益之最大化,为此不惜损害其他人,因此,运作良好的西式民主政治也不过是各集团讨价还价的分利型政治^②,人民彼此之间、且与国家相互对象化;民主衰败后则沦落到被少数精英或寡头所操纵。人民及其主权在西式代议民主制中基本上都是虚悬的。

人民及其当家作主的原则却经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实在化于历史进程之中。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宪法序言又阐明了权力属于人民的历史-政治渊源:“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动词“成为”至关重要:人民不是先验的存在者,而是历史的成为者。列宁曾指出,经由先锋队政党的灌输和领导,工人阶级才从追求经济利益的“自为的”群众转化成为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自觉的”政治阶级^③;同样,“在中国现代制度建构与国家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是轴心力量”,其所承担的两大历史使命之一是“将全体民众凝聚为一个有机的集合体,即人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④。中国共产党凭其先进性自我构建领导权,领导、组织本来被对象化的离散的群众进行政治、社会革命,在此过程中凝聚为政治性的、主体性的“人民”,并不断成长,最终在革命胜利之后成为“国家的主人”。

党通过无所不在的领导,内在于人民之中,从而成为人民的代表。党章开篇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先锋队、领导、代表三个概念均有代表之意,但中国共产党之作为代表,完全不同于西式选举式代表^⑤。有学者把中国共产党称为“规律-使命式代表”,以与西式代表相区别^⑥。依据党章,更准确的命名是“先进性-领导型代表”。党以其先进性成为人民的代表,可谓“先进性代表”;人民在其领导、启发、组织之下,对自己整体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有所自觉并集体追求、逐渐实现,这就体现了党的代表功能。党是通过领导人民共同创造利益、实现共同发展而代表人民的,因而是“领导型代表”。

这样,静态地看,人民共和国内部有先进性代表-领导者与普通群众之别,前者对后者享有领导权。然而,前者本来就出自群众,两者的权力位置之别其实是时间-历史进程意义上的先知先觉先行者与后知后觉后行者之别,群众完全能够进步成为先进分子-领导者。在先进性代表的示范、领导之下,共和国弥漫着你争我赶、积极向上的精神气氛,人民分别处于政治、道德进步、发展的不同阶梯上。大多数群众即便未成为先进分子,至少向往和肯定政治、道德先进性,并在

① J. S. 密尔:《代议制政府》,第11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② 参见曼瑟·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第47—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③ 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317、342页。

④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第236页。

⑤ 参见陈明明、陈远星:《代议制政府与代表制政府:一个理论和历史的比较》,《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

⑥ 景跃进:《代表理论与中国政治——一个比较视野下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

先进分子感召、组织下,力所能及地参与社会各领域的治理和发展,成为“主人翁”。

经由党的领导,离散的、私人性的,甚至是对象化的群众,凝聚、发展为整体性的、政治性的、当家作主的“人民”。因此,人民和国家都不是既成的“是(being)”,而是“成为(becoming)”的历史进程,领导权则是引领者、凝聚者。党章开篇宣示了党的三个自我定位——先锋队、领导、代表,这里的先后次序表明党不是静态的再现式代表;“三个代表”论述中的前两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明确的寻求进步的实践、创造指向;最后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拒绝集团分利政治:人民既然是当家作主的国家主人,就不可能仅仅谋求为自己分利,这不是主人翁精神。相反,宪法序言明确指明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人民首先是建设者,这是国家主人之第一要义,并以此共享发展成果。究其本质,因为缺乏领导权的引领,人民在西式民主制中离散为分利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原则落实为人民共同建设、发展、进步、共享的道德-政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贯通人民为自己而共同建设与为了人民而公平分配这两个环节的政治制度,党的领导权则是这一生生不息的政治体之灵魂和驱动装置。

六、结语

政党作为现代政治之核心组织机制,可以自我构建政治权力,这就是领导权。但在西方,逐渐完善的竞争性选举程序消解了政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致其领导权严重衰败,西方学界的政党研究也就集中于选举而忽视领导权。在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十分强大的,但弥散在各种国家和社会性权力之中,故学界少有将其单独处理、从权力理论上进行专门分析者。

本文把领导权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独立而重要的政治权力类型进行学理性处理,对其起源与发展、正当性、性质、构成进行了直观的刻画和初步的概念化,比较重要的发现是: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权是现代政党特有的政治权力在世界政治体系内因时、因地发展变化之必然产物;领导权的正当性在于理论、政治、道德先进性;领导权是自我构建的、并可创设各种权力之元权力;由此形成领导权统摄的多元一体的复合权力体系,此即当代中国的基本权力生态;经由领导权的领导、凝聚,群众“成为”当家作主的人民。可见,在中国,领导权是一种根本性、至高性、中心性的政治权力,因而它也是理解中国的一个基本方法。“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①理应以领导权为核心概念和分析视角。

中国的规模与领导权统摄的多元一体的复合权力体系之绩效,也足以把领导权确立为人类权力系谱中一个重要类型,因而进一步进行相关研究具有普遍理论意义。为此首先需要进行方法论上的思想解放:反思并超越政治、权力、国家研究的西方主流范式,即基于“理性经济人”预设的政体论、更一般而言的制度主义、结构中心主义范式,由于它们不承认先进性,因而也就无法安顿领导权。可能的替代性范式是政道论或治体论^②,兼顾治道、治人、治法,容纳道德-政治原则,容纳能动的人与组织。由此路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权进行更深入研究,并以领导权为方法,从中外政治历史与理论中辨识、发现具有道德自觉性之政治能动者与其发挥领导作用的机制、推动政治变迁的机理,或可构造出一个道德的、能动的、历史的权力、政治与国家理论。

作者:姚中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100872)

(责任编辑:林立公)

① 参见杨光斌:《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② 参见王绍光:《中国·政道》,第20—6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任锋:《治体论的思想传统与现代启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5期。